

山西文史资料

一九八六年第六辑
(总第四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本辑主编：李 泰

责任编辑：林 登 张 冰 王秀明

刘存善 兰安乐

目 录

薄一波谈抗战初期沁县的斗争形势·····	(1)
张国声谈牺盟会工作·····	张友整理 (9)
我在战动总会宣传部·····	段云 (21)
李公朴在山西·····	石生 (37)
太行山上的军事工业·····	刘鼎 (61)
毛主席和红军总部在石楼前罗村宿营见闻·····	刘展 (76)
红军歼灭阎军第三九二团第一营纪实·····	贺庭芝 (78)
红军和中央军在苏家庄的战斗·····	贺进贤 (78)
红军东征期间阎锡山对人民群众的屠杀·····	刘吉人 (82)
民国年间大同煤矿史略·····	行定远 (93)
李提摩太与山西·····	徐士珣 (103)
献身于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两位日本人·····	裴亚东整理 (129)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生活片断·····	刘静山 (133)
山西临时中学始末·····	张中唐 (135)
忆山西流平同学会·····	高洋 (139)
民革通讯社史略·····	曲咏善 (142)
曾国荃和浚文书局·····	孔毅 (157)
日伪时期山西警务与太原宪兵队本部·····	书福 (163)
傅山先生与太原中药行业·····	王万海 (171)
山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会半月纪要·····	(173)
勘误表·····	(183)

薄一波谈

抗战初期沁县的斗争形势

决死一纵队开到沁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危急，山西危急，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进攻下，节节败退。阎锡山深知晋绥军实力差，难以抵敌，迫切要求扩充新的部队，维持他的存在。当时，我党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党的组织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只作公开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由我出面向阎提出组织新军的建议，阎锡山表示同意，并委我负责筹建。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正式组建了山西新军的第一个团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支部队是由当时已为我党掌握和领导的阎锡山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班”、“民众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第九团的六百余名学员合并组成的。全团兵力约二千人，下辖三个大队，十二个中队，装备齐全。成员全部是知识分子，来自全国二十二个省，还有国外华侨、少数民族等，实际上是一支干部队伍。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率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去五台地区，准备在那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让青年学生跟着八路军学一学。在盂县县政府所在地，我见到了朱总司令。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是朱德的大名谁都知道啊！交谈时他也知道我是一个秘密党员，知道我的情况。朱总司令把毛主席对山西形势是怎样考虑的对我讲了一下。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五台山地区，一二〇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

晋东南，分别开辟根据地。朱总司令说：“晋东北这个地方已经有了部署，一一五师在这里。晋东南还是个空白，一二九师还未开进去。我们得到消息，阎锡山已委托派张慕陶为山西地区游击司令，他要占据这个地方。你们是否能去这个地方开辟工作？”我说：“可以这样办。”就是这么个决定。决定之后，我就到太和岭口（这时阎锡山在这里设有司令部）向阎锡山谈了决死队要到晋东南地区活动的问题，阎欣然答应。以后，我又将决死队赴前线的情况报告了阎锡山，同时提出继续扩大新军，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再组织五至十个旅，阎也认为很必要，全权委托我来办这件事。在太原未失陷前组成了四个决死纵队（旅）和一个工卫旅（开始只一个团），共五个新军旅。决死一纵队第一总队（即最初成立的那个团）开到沁县。二总队（即教五团）原来就在武乡。这时阎又委任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我也同时到达沁县。

决死一总队到达沁县的时间，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十月。

沁县是晋东南抗日活动的中心之一

沁县地处晋东北南部，东有巍巍太行之险，西有苍翠太岳山之调，白晋路贯穿南北，是北控太原，南襟潞安的咽喉重镇。这里是山西有名的米粮仓，自古就是屯兵重地，也是我们开辟根据地的好地方。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到达沁县后，我开始时住在沁县城里的女子高校旧址，一纵队政治部驻在西街的当铺院。不久，安子文同志也来到这里，开始时住在小河村。那时冀豫晋省委派到这地方的一个办事机构，叫特委，安子文是特委书记；以后改为太岳区党委，安子文是区党委书记。与此同时牺盟会沁县中心区也成立了。我们来晋东南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经过我们仔细研究，当即从决死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各地发动群众，

先后成立农会、工会、青救会等组织，并开始训练自卫队。在铜川中学我们还举办了“随营干部学校”。这个学校设四个队，从晋东南各县招生，吸收了七、八百名中、青年来此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当时的政治课程设有“政治形势”、“统一战线”、“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及“中华革命史”等课程。那时很多重要会议都在沁县召开。从抗战爆发至一九三八年，沁县、沁源和安泽及同蒲线以东各县是我们活动的地区，沁县是这个地区的一个中心。开始时八路军总部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都在这里。沁县又是第三行政区十几个县的中心，也是整个决死队、牺盟会发展的一个中心。第三行政区从这里派出工作队，去各县发动群众，搞抗日救亡工作。那时候沁县人参军啊、参加各种团体啊，出的人很多，出的干部也多，出的粮食也多。一九三八年初，决死一纵队在沁县组织了两个新团，即“三总队”和“游击一团”，其中就有沁县的几个游击队参加。

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作所以做得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决死队中，有一大批具有大中学程度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注意建设党，党的骨干分子反过来又推动群众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晋东南发展党，也主要是从沁县先搞起来的。一九三七年我们的工作只是初步打开局面，到一九三八年我们的工作就搞得轰轰烈烈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八路军总部活动在沁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和阎锡山的军队都奔地南逃，而八路军和决死队，则根据毛主席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不但开创了抗日根据地，而且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打击日本侵略军。一九三八年二月底临汾失守以后，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来太行山区，也住在沁县，他以东路军总指

挥的身份和名义，指挥在晋东南的各抗日军队进行战斗。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路军总部在沁县小东岭村，召开了著名的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等人。会议主要讨论了准备反击日军围攻晋东南的战略部署、军事行动及力量的配备等问题。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地区行政主任。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这时国共磨擦已经开始，会议上的斗争很激烈，国民党将领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朱怀冰。直到日军占领沁县时，八路军总部才离开沁县去了武乡。粉碎日军第一次九路围攻后，总部于五月下旬又回到沁县，住在南底水村。从这时起到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二次九路围攻之前，八路军总部的活动主要是在沁县。这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东路军将领会议。

一九三七年冬，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涂锡道、李聚奎也都来沁县活动过，在这一带扩军征兵、发动群众。他们在出来时领导上曾指示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找我。当他们扩了兵没有粮食吃、或者扩兵不顺利的时候就来找我帮助。实际上那时他们找我，也只知道我是个行政主任，别的并不清楚。但是感到找我解决问题是很顺利的。这些负担当时都是由沁县来解决。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率领总部在沁县期间，对决死队的成长十分关怀，给了很大的帮助，特派毕占云同志来给我们当参谋长，指挥作战。为了提高决死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作战能力，总部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在沁县西林村举办了“西林训练班”。决死队的营、连、排指导员和各方面的干部，一批一批地去接受训练。共训练了两期，每篇三、四百人，编两个中队。学员不只是决死一纵队的，还有从决死三纵队来的。训练后也分配到其它新军部队。由于没有正式课堂，就在树林里上课。当时朱总司令每星期一、三、五要从南底水村八路军总部骑马来上课，彭副总司令也来做政治报告，讲课最多的还是朱总司令和左权

参谋长。左权参谋长每周二、四、六来，主要是讲军事。具体主持西林训练班的同志叫张一泉，是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的一位科长，他在那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八路军还派了不少政治、军事干部来帮助我们做工作。

对于“西林训练班”，我们称之为“西林整军”，这在决死队的建设进程中是一件大事，也是十分重要的一课。经过这次训练，决死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得到显著的提高。训练之后，一批旧军官被换掉，代之以新受训结业的同学，决死队从此面貌一新，斗志更加昂扬。

在国共磨擦中建设根据地

沁县当时不但是我们活动的中心区，而且是我们同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的一个地区。

一九三七年冬，我们刚到沁县开辟工作、创建根据地时，发现了几个汉奸恶霸，罪恶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当时我以行政主任的身份，命令旧县长李醉天出布告，杀掉大恶霸“后山大王”张文正。布告出了后，正好阎锡山的民政厅长邱仰浚回到沁县（沁县人），听说我要杀这个人，很是不满地对我说：“你们杀这个人好象不对啊！”我对他说：“非杀不可。”后来他又通过李醉天向我转达他的意思。我说：“他犯有这样大的罪恶，怎么能不给以严厉镇压呢！坚决要杀。”李醉天就传达邱仰浚的话来威胁我：“他还是山西的民政厅长，可以行使职权。”我也让李醉天转告邱仰浚：“我今天已决定要杀了，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也给他一点时间，可以向阎锡山主任请示。我呢，不需要再请示了，因我已得到阎主任的命令，我有这个权限。”对此邱仰浚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就把这个罪恶滔天的后山大王处决了。这件事得到人民的极大拥护。一九三八年初，我们把那个顽固的旧县长李醉天也赶跑了，他是邱仰浚的人。这样，我们首先在沁县

建立了抗日政权，并委派史怀璧（中共党员）担任了沁县县长，抗日的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都向南溃退。当时在沁源驻着国民党第三军曾万钟的部队，常和我们搞磨擦。如决死一总队二大队的大队长、红军干部陈玉堂，在由沁县去沁源驻扎时，行军中途在白狐窰村被曾万钟暗杀了。那时太岳区北部没有八路军的部队，只有决死一纵队在这里独立地创建根据地。一切磨擦都由我们来应付。发生了矛盾我就打电报报告阎锡山，由阎锡山来解决。当时和我们搞磨擦的还有九十三军的刘戡等部队。

公道团当时是阎锡山的一个反共组织，是我们开展抗日工作的一个绊脚石。牺盟会在沁县成立中心区后，由侯振亚等同志负责。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我们研究决定，首先把沁县的公道团合并到沁县牺盟会。沁县公道团的团长叫续质夫，表现比较进步，当时完全跟着我们走。这样我们就把牺盟沁县中心区改成了牺公上党中心区。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一条经验：就是牺盟会可以把公道团合并过来，由我们统一领导掌握。这个经验很快在全省传播开来，直至把公道团总部也合并到牺盟会总部。这样我们就搬掉了这块抗日的绊脚石。

一九三九年元月一日，我们奉党中央指示，在沁县召开了一个“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大会，会的规模很大，有二、四万人参加，这在根据地是罕见的。朱总司令、傅鍾、康克清都参加了这次会。会上朱总司令作了政治报告，我也讲了话。这次会对促进团结抗战有相当作用。

在与日伪和反动顽固派斗争的同时，为了巩固和建设根据地，我们还办了一些工厂、合作社和银行。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利用阎锡山给我们的一点钱，创办了“上党银号”。这是为了防止蒋介石、阎锡山在经济上卡我们，同

时也是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开始时资金不多，在沁县建立了印票子的印刷厂，我和侯振亚名义上担任了正、副经理。票子很快就发行了，为八路军、为地方的抗日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冀南银行成立后，上党银号便并入冀南银行了。

在沁县时期，我们还建立了一些小型的军用工厂，能制造手榴弹和步枪。此外还有服装厂和印刷厂等。

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我们有一个长远的战略打算，时刻警惕着日军和国民党、阎锡山向我们进攻，以及从各方面封锁我们。我们在根据地初步建立后，就逐步向建成一整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体系方向发展，使各级各类机构不断得到完善和健全。

一九三九年底，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这证明了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十二月事变以后，党中央的方针是：为了稳定山西抗战局面，必须继续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同阎锡山的联系。实际上那时与阎锡山已没有多少联系了。牺盟会呢，经过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安排，在沁县的柏木斗沟开了一次大会，大会以后就实际上结束了牺盟会的工作，不过牺盟会的名义还存在了一个时期。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发动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沁县被占领。我们刚刚退出去时，记得王墉（他后来在临汾战役中牺牲了）要求我给他几条枪，他说：“让我学习打打游击战吧。”得到我的同意后，他就和沁县地下党的各方面联合起来，成立了保安二支队这么一个组织，其中还有几个女同志。这支部队也是从沁县成长起来的。他们活动得很出色，经常跑到沁县城外敌人手里把大洋马啦、步枪啦弄出来，而且在南王村还打过一个漂亮仗。象这样在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同志是很多的。

沁县人民对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初期，沁县是晋东南抗日战争活动的中心。与沁县革命历史，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大约是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三九年七月。一九三九年七月敌人占领了沁县以后，我们才逐步地向沁源转移（当然，牺盟会在沁县从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后就开始活动了）。抗战初期，我在沁县住了很长时间指挥部队作战，比如：粉碎日军两次围攻，开展同蒲线上的破击战，大小胡麻战斗，临汾车站战斗以及沁源北边的王和战斗等，都是以沁县为指挥中心的。至于这个地方到底是算老根据地呢还是新区呢，不能以解放的迟早来决定，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实际上直到一九四〇年晋破击战和秋季的百团大战时，我们的力量还仍然能够伸展到沁县附近，如开村、元王这一带。那时我带领的几个团参加百团大战前，就住在开村，开村那时的党组织还是有战斗力的。所以说，实际上敌人最后也没有完全控制了沁县，只是扎了几个据点。除敌人据点以外，从伏牛山一直下来还都是我们的根据地，至少也是游击根据地。当然，到了一九四二年，我们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很多。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部队还经常伸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沁县城周围的农民也依然给我们出公粮。

沁县这一段工作做得比较出色，连当时重庆的报纸、秋林的报纸都有过报道。这除得力于八路军的支持帮助和决死队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共产党员外，安子文同志也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之间来来回回经常合到一起来工作，我们给他们调去十几个同志，安子文同志也把他们的几个军事干部给了我们，象李成芳同志就是从安子文同志处来的。宋任穷同志也一度来过沁县，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

沁县人民在抗日战争开始，曾经为我们开创根据地作出贡献，起到了积极作用。

（下转60页）

张国声谈牺盟会工作

张 友 整理

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五十周年纪念之际，笔者专程到西宁市访问了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原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张国声同志，请他谈谈牺盟会当年的工作及其历史作用。

张国声同志是我省翼城县武子官庄人，出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三一年进山中学毕业，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三五年山西党组织遭到破坏，受到敌人通缉，流亡南京，从事救亡工作，双十二事变后回到山西。一九三七年初参加牺盟会，担任太原市牺盟会一区秘书，继任忻县特派员、岢岚中心区秘书、牺盟总会晋西北办事处主任。张国声同志是牺盟会的高干，对牺盟会的工作知之甚详。这个谈话记录稿是根据他几次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

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至今年已五十周年了。它在党的领导下，对争取民族解放及人民革命事业，起过重大的作用。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四〇年初，三年多的牺盟工作，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在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是令人神往而感到欣慰的。

一九三六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山西政局的转变，是这个转折点的重要部份。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了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率领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同山西省只有一河之隔。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急忙成立了反共的主张公道团，大肆进行欺骗宣传，

在军事上调动剿共大军加强河防，并进军陕北，参加“围剿”红军的反革命活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开展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红军，于一九三六年春节前后，突破敌人防线，渡河东征，进行武装抗日宣传，要求同山西当局联合抗日，允许红军借路开到抗日前线。红军渡河之后，席卷吕梁山区及汾河两岸广大地区，不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人民的拥护，撒下革命的种子，然后主动撤回陕北。五月五日红军发出回师通电，要求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亲笔致函阎锡山，敦促其觉悟，沟通双方，成立谅解。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剿共”的名义下，开进了山西，形成了山西当局的隐患。而更重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已侵略到华北，且得陇望蜀，随时准备将它的铁蹄踏进晋绥的大门。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山西当局已不可能仍用旧有的方式统治下去了，他们的媚日反共政策也不能再欺骗人民了。阎锡山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决策，把不得人心的媚日反共的政策开始向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于是在阎锡山营垒内部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具有抗日要求的进步人士，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纪念日宣布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成立，由阎锡山担任会长。随后不久，薄一波同志应阎锡山的邀请，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同意，从北平回到太原，主持牺盟会的领导工作。薄一波同志的到来，使牺盟会起了一个质的变化。薄一波从北方局带来一批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人如牛荫冠等担任了牺盟会的领导骨干。牺盟会的执委，除梁化之一人以外，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薄一波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把一个阎锡山官办的民众团体，变成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又能适应山西特殊政治环境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这对开展当

时山西抗日救亡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富有成效的特殊的推动作用。

一九三六年出现的山西政局的新变化，引起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注目。一时东北流亡学生，平津爱国青年，上海、武汉、河南等地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成千上万地拥到太原。一九三五年冬山西党组织遭到破坏，我被通缉流亡到南京，从事沈钧儒等七君子领导的救国会工作。十月间在报上看到牺盟会的活动之后，极为兴奋，在双十二西安事变之后，乘车北上，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太原，经组织决定参加牺盟会工作，起先担任牺盟太原市一区的秘书，抗战爆发之后，忻口吃紧之时，被派到忻县担任县特派员（我去忻县之前，已派卢梦同志为特派员。为加强前线工作，我去之后，忻县同时有两个特派员），一九三七年底起担任牺盟会崞岚中心区秘书，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担任牺盟总会晋西北办事处主任，直到晋西事变后牺盟会自行消亡为止。

这三年的工作，给我很多锻炼，使我增长了很多见识，很多经验，的确是值得怀念的。现在回忆党对牺盟会的领导，回忆在牺盟会进行的那些斗争，我们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有些什么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东西呢？我们当时的局面为什么开展得那么快呢？工作进行得为什么那么顺利呢？我想是不是就是这么几条：第一，我们党在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时候，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精神，坚决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第二，依靠武装斗争，独立自主地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三，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展壮大进步力量，支持抗战。

我于一九三一年从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到北平参加了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暑期讲习班，听进步教授施存统、侯外庐、黄松龄等人授课，参加了抗日十人团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回到太原，在新新通讯社当记者。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共山西

省临时工委，同王伯唐、郭进忠（李启华）、张柏枫（李雪峰）等同志一起工作，我直接主持人民武装自卫会工作（记得工委还研究筹划过反蒋抗日大同盟），并代表工委联系社会科学联盟、妇联等方面的工作。那时自己很年轻，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党的领导还处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工作老打不开局面。那时在白区工作，口头上也讲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结合，但总没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那时的人民武装自卫会、社联、妇联等都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但活动范围很狭窄，想公开也公开不起来，总得不到发展。当时还没有能够认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记得我从南京回山西时，在路上看到何应钦调动的兵车、飞机，准备讨伐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自己思想上是希望把蒋介石杀掉，以实现反蒋抗日的目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我思想上很大的震动，也受到很大的教育。后来在牺盟会工作中，才认识到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也认识到牺盟会这个组织，正是我们党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那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也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这种提法。但是，在牺盟会工作的实践中，我们的基本做法现在看来，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比方说，我们把党的政治主张，根据山西的特殊情况，机智地加以改换，变成牺盟会的政治主张，就可以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进行普遍深入的宣传。比如，阎锡山当时还不肯公开用抗日的口号，只提“守土抗战”，我们就把它接过来，用“守土抗战”的口号进行抗日救亡的动员工作。又比如，牺盟会组织的新军，名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用“抗敌”两字，同“抗日”没有实质的区别，这表现了我们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再比如，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我们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纲领，牺盟会在文字形式上

对个别词句加以改动，叫做“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变成自己的纲领，去进行贯彻。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刘少奇、徐向前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公开的共产党人的身份，在太原开展统战工作，给牺盟会工作很多指示，很多支持，实际上是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但在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都是严格保持秘密的，牺盟会的各级负责人一般都是共产党员，尤其严格遵守这条纪律，他们不担任党内职务。牺盟会里面既有共产党员居于领导地位，又有大批革命的进步青年做为骨干。因而它成为党联系广大抗日救国群众的坚强阵地。周恩来同志和刘少奇同志，都在国民师范校园内向牺盟会干部做过报告，我们就用这些报告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去鼓动群众。牺盟总会内以薄一波同志为首的党的公开工作委员会也是极其机密的。牺盟会地方组织中的党员负责人同地方党委的联系，也是极其秘密的。牺盟会中党员和当地一般党员也都不发生横向联系。这样，就使反动顽固分子，找不到任何反对我们的口实，也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牺盟会在政治上坚决支持共产党、八路军，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抗日力量，任何人没有反对的理由。牺盟会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山西新派自居，以区别于顽固守旧的旧派，又给自己加了一层保护色，便利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一九三九年“七·七”抗战二周年时，针对蒋介石、阎锡山阴谋妥协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反共高潮的实际危机，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牺盟会坚决拥护这个主张，并用这三个口号与顽固反共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政治上取得极大主动。因为这个三坚持、三反对的口号，是代表全民族利益的，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潮流，是任何人没有理由反对、任何力量无法抗拒的。一九三九年的晋西十二月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时期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阎锡山阴谋策划向牺盟会决死队开刀的时

候，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口号。在阎锡山命令旧军同日本侵略者秘密勾结协调部署围攻决死二纵队，决死二纵队决然奋起进行自卫反击时，阎锡山妄称二纵队为“叛军”，进行所谓讨伐。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山西人民一眼看穿了反动派的真面目，我们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对顽固反共分子的无耻谰言，用事实加以反驳，对他们投降、倒退的反共阴谋，不断地进行揭露，对他们的武装挑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与八路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予以坚决的自卫反击，斩断他们的黑手。对山西新旧两派的冲突，中共中央采取了居中调解的方式，在一九四〇春，妥善地予以解决。在晋西十二月事变中，阎锡山没有捞到任何好处，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从而使他在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不得不保持中立。这又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山西新派在击败阎锡山的反共阴谋后，还给阎锡山留有余地，牺盟总会撤出阎的驻地秋林，移至晋东南薄一波同志的驻地，并且还向阎报告工作。只是由于阎的冥顽不化，牺盟会在完成党交给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而自行消亡。

依靠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山西旧政权原来是建立在军阀的刺刀尖上的，又加上日本军阀的侵略，革命人民如果不拿起武器，那就只能当亡国奴。八路军三大主力进入山西，是牺盟会的强大后盾。牺盟会在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工作中，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与着力于武装群众，各地普遍组织自卫队、游击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扩大抗日武装，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八路军和新军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增强了抗战的武装力量。正是由于在武装部队的保护下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积极武装群众，建立和扩大武装部队，二者有机联系，相互促进，才使牺盟会的群众工作具